

前 言

本书收集的是省内外一些老工人的回忆录，也是一部叙述他们在旧社会遭遇的血泪史。从这里，我们看到在反动统治者和剥削阶级的残酷统治、压迫和剥削下，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过着多么悲惨的生活，受着多么沉重的灾难，以及他们在同压迫者和剥削者进行斗争中又是多么英勇顽强，这是对旧社会无情的揭露和控诉，也是关于什么是阶级压迫、阶级剥削和阶级斗争的具体生动的说明。

在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期，也就是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是一个自始至终充满着阶级斗争的时期，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经济战线上、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阶级斗争，将是长期的、复杂的、曲折的。为了在这场斗争中取得胜利，就必须反复地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思想重新教育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

进行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教育，除了很好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毛主席的著作，深入实际，参加现实的斗争外，在旧社会受过苦难的人想想过去的阶级压迫、阶级剥削，在新社会成长起来的青年人了解一些过去阶级压迫、阶级剥削的历史，是大有好处的。懂得过去，才能懂得现在。只有看清了资本主义制度的丑恶，才能更加了解社会主义制度的美好；对旧社会有着刻骨仇恨，才能对新社会有无比的爱。我们编辑这本书，就是为了让老一辈和年轻一代的人，都能够从中受到一些活的阶级斗争的教育。特别是广大的青年工人同志，他们是长在“背后没有敌人的鞭子，肩上没有沉重的担子”的新社会，对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过去被压迫、被剥削、被奴役的痛苦生活缺乏深切的体会，通过这些老工人的回忆录，他们就能够得到一些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历史知识，以便进一步提高阶级觉悟，辨明是非，站稳立场，坚定社会主义方向，并把老一辈工人对旧社会的刻骨仇恨，对新社会的无比热爱，以及他们的革命思想和革命经验继承下来，把无产阶级光荣的“家谱”，一代一代地传下去。

目 录

- 要革命到底.....朱英如 (1)
- 我的三十年.....郭可銀 (9)
- 旧社会是地獄
- 新社会是天堂.....陈淑芝 (18)
- 我当学徒的时候.....林建华 (24)
- “卖身契”.....陈宗玉 (31)
- 伤疤恩仇記.....何永安 (34)
- 林場旧恨.....李承福 (39)
- 我家的变迁.....陈大妹 (43)
- 三輪車工人的今昔.....张增福 (46)
- “九命沉冤”今雪恨，党的恩情記心間.....阮宝玉 (50)

要革命到底

上海国棉十七厂退休老工人 朱英如

我生长在旧社会的一个穷苦人家。父亲从事重体力劳动。我三岁时，父亲因为过度劳累，当场吐血死在工地上。母亲带着我们姊妹三人，怎么生活呢？很多人劝母亲把我送去当童养媳，母亲不肯。因为我母亲自己就受过当童养媳的苦，我姐姐也是当童养媳被折磨而死的。到了七岁，没有办法，我被迫给地主放牛。奴隶生活便从此开始了。有一次晒谷子，很多鸡跑来啄，我赶了一群，又来了一群，地主看见了，不分青红皂白，一铁锹打过来，血流如注，至今脸上还留下一道伤疤。母亲知道了很心疼，托人把我从地主家里接回来。以后母亲当保姆，把我带在身边，我也帮着母亲拣柴火，做零碎事。到了十一岁，我又给资本家当婢女。伺候的是一个大烟鬼，他抽烟，我搥腿，一打瞌睡，他就用烟钎戳我。一次给他捧茶，不小心把茶杯盖子打破了，挨了毒打。痛苦的生活折磨得我想自杀，把盐泡在开水里当盐卤喝，当然，这样是死不了的。

十三岁时母亲用几年来做针线积下的一些钱，托人把我介绍到上海英国人开办的怡和纱厂去做工。过去做工，尤其是女工，真是牛马不如。进出厂都要搜身，一天干十六小时，上午四点上

工，下午八点收工，家里沒钟，掌握不了时间，只好半夜起来看月亮，阴天什么也看不到，弄得觉也不敢睡。晚上走路也不方便，流氓很多，小姐妹只好结伴同行。在厂里挨打受罰更不用說，只要是五六十岁的老紡織工人，至今身上都留有伤疤。女工怀了孕不敢說，怕被停掉工作。生了孩子也沒人照顾，有个女工把孩子放在家里，自己去上工，晚上回家，发现孩子的肚腸被猫抓出来了。她哭，我們也哭。这种慘狀，又何止一个，当时农村破产，社会上失业很多，多少人冬天沒棉衣，冻死在馬路上。这种情况，当时我认为是我们穷人命苦。算命先生說：“今世不修来世苦”；“要享来生福，今生多念佛”。为了寻求寄托，我年紀輕輕的就成了虔誠的佛教徒，每天做工后就烧香念佛，紗厂姊妹給我起了个外号叫“吃素姑娘”。其实，那算命先生的話是騙人的，信了教，我还不是一样当牛馬！

一九二五年五月十五日，日本帝国主义分子枪杀了中国工人顧正紅。五月三十日英帝国主义分子在南京路上，对手无寸鉄的上海工人、学生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大屠杀。群情激憤，全市工人起来罢工，接着学生罢課，商人罢市，在党的领导下，上海人民展开了轰轰烈烈的“五卅”反帝斗争。就在这些动蕩的日子里，我和小姐妹們一起参加了群众大会。在这次会上，我第一次听到一位年輕的共产党员讲革命道理。他問我們，工人为什么受苦，工人和資本家究竟誰养活誰，男女为什么不平等，等等。接着他又告訴我們，工人所以受苦受难，牛馬不如，随时被人枪杀，并不是工人的命不好，而是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害的。工人只有团结起来，組織工会，起来斗争，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打倒反动派才能翻身。听了这些話，我心里想：“对啊，要是我受苦是命

里注定，难道千千万万的工人和穷苦人的命运都该这么苦么？”我就这样逐渐觉醒过来了。从此我积极地参加各种活动，并参加了工会组织。当时党在工人中办夜校，刘少奇主席、杨之华大姐都是夜校的老师。他们教我们读书，给我们讲道理。革命道理打开了我的眼界，使我知道世界上已有一个工人阶级当家的国家，那就是苏联，在那里工人阶级真正翻了身，男女平等。听了这些，我浑身是劲，积极动员小姊妹们上工人夜校，参加群众集会，听共产党人和工会领导人的演讲。斗争锻炼人，斗争教育人，在这些活动中，我懂得了许多革命道理，觉得自己身上产生了一股力量。就在这一年夏天，我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刚参加党的时候，我只想到要争取自由解放，要生活得象个人，就得要斗争。我们向资本家提出要办夜校，让工人读书，要增加工资，不许无故打人骂人。当时好多厂的资本家开除了大批工人，被开除的都是党、团员，积极分子。我所在的工厂，资本家害怕工人和他斗争，答应了一些条件。如办夜校，但不许办在厂里。为了监视和破坏我们的活动，资本家也派人参加识字班，进行捣乱。在厂里，我在小姊妹中积极组织“姊妹团”，在男工中组织“兄弟队”，通过各种方式把工人组织起来，发展工会。资本家当然也就把我看成是眼中钉，千方百计想把我拔掉。

一天下班后，我正准备出厂开会，资本家的代理人在门口拦住了我说，“阿毛姊（这是我过去的名字）你工作蛮好，我想升你做招工，每月工资四十元，而且招一个工人，人家还会送一份厚礼。……你可以退出工会。”我心里想，这是收买我了，我冷冷地说：“我没有资格做招工，我做不来。”资本家代理人一听，便面孔一板，直截了当地说：“我知道你是女工的总代表，

你辞职吧，我一次发给你辞职金五百元”。我嘲笑说：“我们靠做工吃饭，五百块钱我不要。要嘛，你开除吧！”他只好尴尬地走了。

当然，国内外反动派是不会让革命人民抬起头来的。“五卅”大罢工后，帝国主义勾结军阀对上海工人运动进行残酷的镇压，他们查封了上海总工会，逮捕并杀害了工人领袖、优秀的中国共产党人刘华同志。一九二六年春天，我所在的工厂在一次罢工中也遭到了镇压，资本家乘机开除了三分之一工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把男工女工都组织起来，抱着有饭大家吃、有难一起当的主意和资本家作斗争，我们约定举行罢工，在同一时间内把车关了。谁知敌人早就作好了对付我们的准备，一关车，敌人立即在车间抓人，一下子被抓走二十六人，还打伤了不少。当时我们还没经验，罢工遭到失败，六个工人牺牲在外国监牢里。这件事说明了我們工人阶级不掌握政权，就没有自由，連生命也没有保障。当时敌人到处在抓我和其他为首两个人，还扬言只要抓住三人中的一个，就把被捕的全放出来。但没有一个工人去告诉敌人，反而更加小心掩护我。我就在兄弟姐妹们的掩护下，离开了被警察包围的工厂。于是，我失业了。

一九二六年五月，上海工人派我和其他同志到广州去出席第三次全国劳动代表大会。当时大会交给上海代表的任务，是把上海工人进一步组织起来，和军阀作斗争，迎接国民革命军北伐。回到上海，我被派到闸北去组织丝厂工会，不久担任了丝厂工会主任。我们的任务是组织工人，宣传革命道理。

一九二七年，党接受了一、二次武装起义的失败教训，重新组织第三次武装起义。周总理当时是领导人之一。我们包围了敌

人的司令部、警察局，面对面和軍閥作斗争。虽然我們武器少又不好，但我們都很勇敢。打了两天一夜，到三月二十二日，我們胜利了，总工会也恢复了，开除的工人也复工了，党組織了統一战綫，革命影响扩大了。不久，北伐軍就进入了上海。

正当上海工人和人民为了大革命的胜利而欢欣鼓舞的时候，当了帝国主义走狗的蒋介石叛变了革命，他向中国人民伸出了罪恶的血手。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发动了反革命政变，杀害了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同志，解散了上海工人糾察队。四月十三日蒋介石又命令反动军队向示威的工人群众开枪屠杀，宝山路上一时血流成河。这一天，我也在示威群众中，亲眼看到許多阶级兄弟在敌人枪林弹雨中倒了下去。白色恐怖籠罩着上海，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不断被逮捕，被屠杀，总数不是几十几百，而是成千上万。在这黑暗的日子里，虽然天天都有坐牢杀头的危险，但我不怕，我只感到为了革命就是牺牲也是光荣的。每一次听到同志們牺牲的消息，我除了悲愤外，就想到自己的肩上又多了一副担子，需要加强工作，继承同志們的未完的事业。

根据党組織的决定，我从閘北轉移到浦东工作。在一九二七年十一月，我被捕入獄。一抓进去，就打嘴巴，一掌打下来，眼前尽冒火星。但我沒流一滴眼泪，我认为为革命而牺牲是光荣的。我一面挨打，一面大罵，于是他們又改用鞭子抽。鞭子抽在皮肤上，火辣辣地，只感到肉要撕开似的。我用最大毅力忍住不叫一声。敌人沒办法，把我关到号子里，衣服被血粘在皮肤上，痛极了，我咬紧牙。以后我被判了四年徒刑。

革命到处都有斗争。在監獄里，我和几个政治犯建立了联系，同时利用一切机会接触其他犯人，組織难友为改善生活、取



消私刑而斗争。那时监狱里有許多黑暗制度，女犯人稍有违抗，就要“跪釘板”。当时，我們向看守人提出，如果不取消这个制度，我們就絕食，看守人没办法只好取消了这项私刑。

在被捕的时候，我已經怀孕几个月，直到快临盆时监狱当局还不准出来分娩，甚至不給生孩子所需的用水。难友們知道以后，就把自己吃的一杯杯开水省下来，为孩子洗身。我給这个在苦难中誕生的第一个孩子取名“獄生”。看守还要我把孩子交出

来，送到天主堂去收养，我拒絕了。看守說：“你是有罪的，死后要进地獄，让孩子长大后做个神父，就可以拯救你的灵魂。”我气愤地說：“我的灵魂不需要拯救，你这个帝国主义走狗，才是个肮脏的灵魂。”孩子最后保全下来了。滿月以后，托人把孩子送到自己的家里。当我出獄的时候，他已經四岁。出獄以后，先住在青浦的夫家。我丈夫是个店員，家庭生活是困难的。經濟上的困难倒不怕，真正的困难，在于剛入獄的时候，还能和獄外党的組織保持联系，而在出獄的前一年，联系中断了。为了这，我决心回到上海，到工厂做工，找寻党的組織。

这是一段十分艰难的岁月。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下，共产党的組織遭到严重破坏，过去熟悉的同志，有的牺牲了，有的离开了，有的掩蔽起来了。也有一些人，經不起考驗，投敌叛变了。找寻党的組織是多么不容易啊！我跑了几家工厂，人家一了解我的过去，就拒絕了。好不容易找到一个临时工做，因为反抗資本家的无理压迫，狗腿子說我是“搗乱分子”，又被赶了出来。以后，我做过小販，做过佣工，住过难民所。在难民所里，因为我罵了蔣介石，又被赶了出来。

抗日战争爆发了，我进了玻璃厂，做宿舍管理員。有了固定的工作也就有了工作的陣地。那个厂的青年工人很多，我給他們讲大革命斗争的故事，讲抗日救国的大道理，引导青年走上革命的道路。从此，宿舍就成为进行抗日活动的場所。

抗日战争结束后，党在上海的地下組織，积极开展工会活动。一位党的工作者来到玻璃厂，我終於找到了自己的組織，第二次得到了政治生命。我多高兴啊！这时，虽然我已經年近五十，但能重新在党的直接领导下工作，我感到自己越发年青了。我积

极投入了上海人民反饥饿、反内战的斗争，同时负责保管党的文件和分发党的宣传品。在党的教育下，就在我们经常来往住宿的三十多个小小工人宿舍里，有四分之一工人先后参加了共产党。

我自己的孩子“狱生”也长大成人了，并且进了中学，积极参加学生运动。一九四六年，这个在苦难中诞生的孩子，也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蒋介石发动的反革命内战，被中国人民彻底击败了。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三日，上海终于获得了解放。我从自己亲身经历中，体会到政权是多么可贵啊，它是无数烈士的鲜血换来的。今天工人的头可真是抬起来了，妇女也真正翻了身，过去的苦难日子也一去不复返了。但是我们不能忘记过去，今天，我们的敌人还存在，帝国主义、修正主义者和反动派还在千方百计污蔑破坏我们，国内外阶级斗争还很尖锐复杂，我们绝不能忘记阶级斗争。

今年，我六十四岁了。从一九五五年退休以后，我就参加街道里弄工作，被选为里弄居民委员会副主任，和这个地区的党支部书记。我参加了上海老工人讲师团，经常到各个工厂、学校、机关、团体做报告，讲工人阶级革命斗争的光荣传统。在我退休的第二年，在一次小型座谈会上，会见了当年上海第三次武装起义的领导人之一周恩来同志。我同他握手的时候，问道：“周总理，还记得起朱英如何？”周恩来同志看看我，记起来了，很亲切地问我近况。当我告诉他已经光荣退休后，周总理说：“从工厂里退休了，革命是不能退休的，我们要永远革命下去。”

我牢牢地记住了周总理的教导：“要永远革命下去！”

苏 田插图

我的三十年

福州火柴厂 郭可銀

徒工生活 牛馬不如

我家原住福州市郊郭宅乡，祖父和父亲因为在农村受尽压迫剝削，生活过不下去，都跑到城里火柴厂当工人。两个人虽說找到工做，掙到的錢却填不飽肚子。

一九三四年，我十三岁了。家里央人讲情，也把我送到建华火柴厂当学徒。进厂的头一天，大主管王营佛(老板的亲戚)先对我宣布了一套“厂規”，接下去說：“要当学徒可以，不过你要听清楚，学艺的五年中間，工錢分文不給，干活要老老实实，要是偷懶耍滑头，可別怪老子无情！”

悲慘的学徒生活开始了。每天清早五点钟，我們当学徒的就要去上班，一直干到晚上十一点多钟，每天都得干十三、四个钟头，到下班时累得全身骨头象散了架似的。工厂的設备非常恶劣，我們的工場就象猪舍一样，用木板胡乱釘起来，又脏又悶，又低又暗，伸手就可以摸着屋頂。“夏天是蒸籠，冬天是冰窟。”劳动保护根本談不上，工伤事故成了家常便飯。有一天，工人林德安的孙女剛上完夜班，一連干了十几个钟头，又餓又乏，狠心

的資本家却硬迫着她再干日班。当她强打精神去上工时，由于过度疲劳，一时支撑不住，用破麻袋做的围裙被机器咬住，整个人被卷了进去，肚皮被揭开来，机器立时染满鲜血。等大伙把她救下来送医院时，在半路就死去了。我們成品車間从运火柴枝一直到打篾包装等八、九道工序，全部是手工操作。我打篾繞着工作台轉，一天要轉上三百多圈，就象驴馬拉着石磨团团轉，头都轉暈了，手脚还經常被竹篾割得皮破血流。



生离死別 家破人亡

一九三七年，我的老祖父已經年邁体衰。資本家把我祖父的血吮干了，看看沒有有什么“油水”，就把他撵了出来。祖父失业了，到处找不到事做，只好在家里生悶气。祖母、母亲做的竹器沒有銷路，也停了下来。我和父亲在厂里做工，資本

家拖着不发工錢，沒有能力接济家里，家里的几口人只好常常断炊。为了一家人糊口，母亲含着泪，忍痛把我最小的一个妹妹卖掉，卖的錢还被伪保长从中勒索去一部分。卖妹妹的錢很快就用光了，生活仍然沒出路，母亲只好扛着鋤头，到乡下去拣番薯（人家收获后遺漏下来的）、挖野菜。一天，母亲拾了一小籃碎番

薯和野菜，拖着疲憊的身子从閩侯向干回来，还没开口，我的父亲悲痛地说：“孩子他媽，我对不起你，昨天我把娉娉卖到永泰去了。”娉娉是我的大妹妹，那时已經十二岁了，母亲听到这件事，一时哭得暈了过去。接連从母亲身上割去两块肉，做母亲的怎么不心疼啊！

禍不单行，旧社会工人家的灾难，一个跟着一个。我的叔父被抓去当壮丁了。不久祖父又餓死了。老祖母过于伤心，哭得两眼紅肿，失明了。第二天，我的姑母赶来，带来几块钱买不起一口薄木棺材，只好买了几块木板，自己釘起来，把祖父收埋了。

我和父亲半飢半飽为老板卖命，仍然顾不了家里。于是，家庭的生活重担全擱在母亲一个人身上。母亲經不起常年累月的折磨，终于染上了病，沒有錢請医生，不几天，母亲也死了。我的祖母自从祖父死后，哭坏了身体，接着也去世了。亲戚、朋友和我家一样穷，无力帮助。祖母、母亲死后不說买棺材，就是买几块木板也是买不起啊！父亲只好把家里的一些零星木板拼拼接接，釘成木槽，收殮起来，抬到后山埋葬。死的死了，卖的卖了，抓的抓了，我的一家就这样家破人亡。

餓了工人 肥了老板

不久，日本鬼子占領了福州，建华火柴厂搬到南平。

在南平，我們工人受的苦难更加深重。大老板林弥鉅知道我們回不了福州，就想方設法，更残忍地剝削工人。那时候，他实行一种“定額制”，以米作工資。規定：男工每天打篋十三件，发糙米一斤十小两；女工装盒二十盤，发一斤四小两。沒有完成定額的，一粒米也不給。資本家发的“工資米”霉烂不堪，吃下

去就拉肚子，我們的身体越拖越坏了。狼心狗肺的資本家还进一步吮吸工人的膏血，用“罰工”和扣“工資米”等种种办法，来剝削我們工人。我們只要迟到几分钟，或是不小心踩破了地上一个火柴盒，就扣一天的粮食，还用“开除”来威胁我們。可是，工資米却一拖再拖，几个月都不发。有时发了一点烂米下来，資本家豢养的那班监工，又从中舞弊，尅扣起一部分，拿去换粉干、魚肉，大吃大喝，根本不顾工人死活。

工人沒有粮食吃，只好利用工余時間上山挖竹笋、采土木耳来充饥。我們餓着肚子，每天还要干十几个钟头的活，不久，工人生病的很多，有打摆子的，有水肿的，有痢疾的……老板对生病的工人不但不帮助治疗，还硬逼着带病上班。那时我打摆子很厉害，发冷的时候还能勉强干活，发高烧的时候就无法支持了。可是老板管你能支持不能支持，要你上班你就得上班。林弥鉅豢养出来的一伙狗腿和监工，卖力地監視着我們。我病得不行，好几天定額沒有完成。和我一起干活的郑依指僥倖沒有生病，他很同情我，起早貪黑拼着命干，尽量多做几件，把多余的件数悄悄地拿給我，让我湊满定額，能够領到一点霉米度日。可是有一天被监工江得斌发现了。这个坏家伙如狼似虎地猛扑过来，揪住我的破麻袋衣，罵道：“你这小子好大胆，竟敢投机取巧！”說毕，用力把我一推，我差点栽倒下去。他又轉脸对郑依指說：“原来是你干的好事！好，今天連你的工資粮也不发給，让你去喝西北風！”在旧社会，我們工人兄弟連讲一点階級友爱，也成了“罪过”啊！

悲惨的学徒生活熬过去了，我出了师，学到了一手打篾的技朮，心里真高兴啊！可是不久，我的心就冷了下來。說实話，打

篾的技術我是算不錯的，每天我干十三个鐘頭，天天都能打出十三件。這時候抗戰已經勝利，建華火柴廠遷回福州，老板實行按件發錢的辦法，一件三分工錢，一天是三角九分，一月發一次，算起來有十來元。可是，在國民黨反動統治時代，物價不斷飛漲，十幾塊錢到了月底往往買不了什麼東西。有一個月，我把領來的工錢買一條面粉袋和十五斤米糠，就雙手空空了。想想看，每天要干十三个鐘頭的重活，不要說十五斤米糠，就是十五斤大米也維持不了一個月的生活啊！為了活命，我常常利用休息的時間，悄悄跑到外面挖野菜充飢。天天吞糠咽菜，把腸胃都搞壞了。實在難吃，我就想了個辦法：少買些米糠，加買點豆渣，把豆渣、米糠、野菜混和在一起，做成餅子，弄來兩塊磚頭砌個土灶，上面放塊鐵板算是鍋，把做好的餅放在上面烤，烤一次吃兩天。

肚子塞不飽，穿的就更不用提了。那時候，我們工人做不起衣服，夏天就光着上身，穿着一條短褲去上班。我的一條短褲，補了又破，破了又補，已經到了破爛不堪的地步；廠里女工又多，實在為難，我只好少買糠，擠一點錢去買條面粉袋，自己當“裁縫”，胡亂做一條短褲。可是到了冬天，短褲穿不得，光着上身更不行，我就披着麻袋上班。

大老板林彌鉅從工人身上榨取大量血汗，發家致富，連浙江、江蘇等地也有他的火柴廠。除此之外，他又在家乡長樂買了四百多亩田，在南平、沙縣、邵武、將樂等縣買了大片大片的山林，更加殘酷地剝削勞動人民。林彌鉅還用剝削我們工人的血汗在倉前山蓋了一座極其華麗的“公館”，三妻四妾，終日在那里花天酒地，恣肆玩樂。他又勾結官府，掠奪民女，糟蹋女工，這個“火

柴大王”的罪孽真是太多了。

打罵欺压 种种迫害

資本家欺压工人的办法什么都有。他規定每天下班或上厕所，只要离开車間一步，就要搜查，誰违抗了，就逃不了老板的文明棍和工头的皮鞭。有一回，我和郑天寿去解手，天寿沒經搜查就出去了，工头一見馬上追了上去，不問青紅皂白，劈头盖脑就給他几鞭。我忍不住了，去拉天寿一把，工头的皮鞭就落在我身上，打得我們两个皮破血流。男工被搜被打，这是家常便飯。更苦的还是女工。女工和男工一样要挨搜查，老板通过搜身，可以發現女工有无怀孕，凡是怀孕的女工，一經发现，就被开除出去。好多女工迫得沒有办法，都用布带束紧腹部，常常引起流产。工人本身受到資本家的迫害，第二代在母亲的肚里也受到資本家的“搜身制”摧残，这是何等的残酷！

火柴厂还在南平的时候，附近有一个亭子，大家叫它“死人亭”。病重的工人不能再上班了，老板就叫狗腿子把病危的工人扔到“死人亭”去。一天，阮原杭和王茂盛病得不能起床，老板就指使工头把他俩拖入“死人亭”。大家听到这个情况，气得不得了，把他們两人抬回来，放点“干粮”和开水在床边給他們吃，我們又趕去上班。等我們下班回来一看，阮原杭和王茂盛已經断气了。那时候，在資本家的眼里，死一个工人就和死一只蚂蚁一样，根本不放在心上。資本家說：“我有錢宁可塞城牆（用在官府上面），也不塞狗洞（指給工人）。”常常都是工人們东借西凑，替死去的工人料理后事。工人的仇恨，是多么深重啊！



工人們对資本家的这种苛待，没有一个不是满腔怒火的。資本家为了维护他的剝削地位，花钱买通官府来对付我們。記得一九三八年的冬天，我看到工人兄弟实在太苦了，說了句“杀罪好过、餓罪难当”的話，传到老板耳朵，第二天夜里十二点钟就来了几个警察把我抓走了。整整关了三天三夜，不給我吃飯。我受了餓罪不算，还罰了我四百元印花錢才放出来。……

当家作主 坚持革命

一九四九年八月十七日，福州解放了。我們工人由奴隶变成了主人。我們不再受資本家的压迫和剝削了。經過党的教育，工人們的階級覺悟不断提高，逐步明确了只有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奋斗，才有劳动人民的彻底解放。于是大家都忘我劳动、积极和資本家违法行为进行斗争，在这些斗争中，許多人加入了共产

党和共青团，当了劳动模范，有一百一十二个工人提拔为干部（其中有十一人后来调到福州市各工厂担任书记、厂长）。在旧社会受资本家残酷压迫剥削的老工人林务务，现在是我们厂的党委书记，党委副书记刘为春，副厂长黄瑞香、魏子来，厂工会主席林依明等，原先也都是火柴厂的老工人。我们厂里还有十五个工人当上省、市人民代表，省市政协、工会、妇联委员。这些都说明，在新社会我们工人阶级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了。

十多年来，我们厂在国家的关心下，新建了很多厂房，旧的厂房也修缮一新。现在我们的成品车间不再是过去那个又低又脏的工场，而是一座五倍于原来工场的崭新砖瓦房。厂房宽敞、明亮，还装有电风扇。生产上有贴面机、套盒机、刷磷机，机械化程度达到50%以上，劳动强度减低，生产率又大大提高。从前我替资本家干活，因为全是落后的手工操作，每天干了十三个钟头才打十三箕；现在实现半自动化操作，每天八小时打箕我能打出一百二十八件。党一面在政治思想上帮助我们工人提高觉悟，另一面在物质福利上生活上也十分关怀我们。工人的工资增加了，劳动条件改善了，工人有自己的宿舍、食堂、托儿所、俱乐部、医疗室，还办了职工业余文化学校，为工人读书识字创造了条件。

我家也和所有的工人一样，生活过得很幸福。我的父亲现在已经六十八岁了，从一九五三年起，他退休在家养老，度着愉快的晚年。曾经被国民党抓去当壮丁，后来逃回来的叔父，眼下也已五十出头，他是福州盖山区农械厂的技术工人。大弟弟郭金佛在仓山竹器厂工作，他爱人是刻印社的会计，两个男孩大的已经上了小学，一家人生活过得很好。小弟弟郭珠佛，一解放就上了

学校，以后又由厂里保送到福州工业学校学习，一九五六年毕业后，分配到东北工作，因为身体不好又重回福州。他一面医病一面休养，前后一年多，国家花了許多医药費不說，每月工資还按照規定发給。我常常想：“我的这个小弟弟真幸运，要是在解放前，不用說早就被資本家拖到“死人亭”折磨死了！可是現在完全不同，政府对他很照顾，他的身体恢复健康后，就分配到福州第一化工厂当机电工人。再說我自己吧，从一九五一年到一九五五年，我都被厂里評为先进生产者。一九五六年九月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以后我一直是福州市工业劳动模范。一九六〇年一月，我担任了成品車間主任。党的信任和关怀，鼓舞我們更好地工作。

今天，我們有了这一切，是党給我們带来的，是无数的革命先烈經過了几十年的流血斗争得来的。革命前輩，在党的领导下，打倒了三大敌人，消灭了剝削制度，为我們开辟了一条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这是多么不容易啊！現在，世界上帝国主义和反动派仍然存在，国内的阶级敌人仍然存在，阶级斗争还在继续。我們有些青年工人，因为年紀輕、閱历浅，对阶级压迫和阶级剝削認識还不那么清楚，所以我們要时时讲述工人阶级在旧社会受压迫受剝削的苦难生活，多讲工人阶级在党的领导下反抗压迫、反抗剝削的斗争，多讲解放后工人阶级艰苦奋斗，开展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的历史，帮助他們提高阶级觉悟，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我是一个工人，一个共产党员，我一定要更加出色地完成党交給的任务，为建設社会主义和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奋斗到底。

丁 行、笔龙插图

旧社会是地獄，新社会是天堂

福州市食杂公司北大商店副主任 陈淑芝

在人吃人的旧社会里，我一家五口，被国民党反动派和地主资产阶级害死三口；要不是解放得早，我媽和我也不能活到今天。

我家住在福州市郊后屿乡大桥村，家里本来有父亲、母亲、哥哥、姐姐和我五口人。大桥村地势低，年年发洪水、年年遭灾害，是个“十年九不收”的地方。我家向地主借种子来种自己的三分地，借一斗要还两斗。我們借了一担种子谷，利滾利，不到三年，要还他六担。天灾厉害，人禍更凶。国民党抽壮丁，弄得人心惶惶，当我三岁时，我父亲为了逃避抓壮丁，不得不抛妻别子，背离乡井，跑到厦門一个学校里当炊事員。父亲沒有煮飯煮菜的技术，只得做挑水洗菜的杂工。学校人多，需水量大，父亲一天从早挑水挑到晚，大清早还得起来洗菜、搞杂务。由于过度劳累，他不久就得了胃病，經常疼痛。以后炊事員当不成了，回家又沒有路費，只好到我表哥家里暫住，写信回家要我母亲寄路費。天啊，家里連糊口都很困难，那能筹出这笔路費来？母亲經常哭泣，我們也非常伤心，但又有什么办法呢？不料一难未消，一灾又起：我六岁那年，一天半夜里，突然有一伙人連喊帶罵，猛撞我家房門，母亲和我們吓得蜷縮一团。一会儿，門被撞开

了，伪保长带着他的爪牙們气势汹汹地闖进来，不由分說，就把我哥哥給綁走了。哥哥是我家唯一的劳动力，被抓走了，今后一家生活又靠誰呢？我母亲扑上去向伪保长苦苦哀求，保长說：

“你有錢嗎？如果有錢，就是十个八个孩子，也不要当兵，沒有錢，哼，独子也要去！”眼睜睜看着哥哥被抓走，母亲抱着我姐妹两个痛哭流涕。哥哥被抓走后，我母亲只好将仅有的三分田卖掉，还了地主的高利貸，另外剩下一点錢，就到城里挑担卖菜。但到城里卖菜，又受伪警察、伪兵欺凌，他們买菜不但不給錢，有时还拳打脚踢。一次，我母亲卖黄菲菜，全担都被搶走。这样連搶几次，本錢也全搞光了。一天，一个邻居从南平回来，說是碰見了我哥哥，說我哥哥病得很厉害，脸肿、脚肿，全身生疥疮，要我母亲寄些赤豆、紅糖去。母亲听了心如刀割，豆大的眼泪一串串地滾了下来。家里典尽卖光，湊了一些錢，买了三斤紅糖、二斤赤豆托邻居带去給哥哥。可是等邻居把东西送去时，我哥哥已被折磨死去了。当我母亲得知哥哥死了的消息，又想起父亲流落异乡，昏倒了好几次。但我哥哥被抓了和受折磨而死的消息，一直沒敢告訴我父亲。其实，我父亲在厦門因貧病交迫，也已不在人間了。

我們终于知道了爸爸死去的消息，母亲失去儿子，又死了丈夫，整天以泪洗脸。这时，一些有錢人家都風言冷語諷刺我們，說我母亲命歹，吃掉了儿子，又尅死了丈夫。邻里穷人可怜我們，但心有余而力不足，自己都吃不飽，那能領得上我們。后来，我舅母来我家，見我家困难，养活不了三个人，要我媽把姐姐給她。母亲虽然舍不得，但为了減輕負担，同时也希望姐姐在她家能过一些好日子，所以也就答应了。誰知道，不久，福州二度淪陷，舅母家生活也过不下去，不得已又将我姐姐卖给长乐一家地

主做童养媳。說是童养媳，其实是奴隶。那时，我姐姐十三岁，而地主儿子才五岁，成天要抱着这个五岁的“丈夫”，侍候他吃饭、睡觉、大小便。地主一不如意，非打即骂，特别是凶恶的地主婆，口口声声骂我姐姐“命贱”、“苦相”，经常不给饭吃。我姐姐在他們压迫、凌辱下，有苦无处诉，经常偷偷背着人哭。没多久，就被折磨得不象人样。有一次，我二婶从长乐回来，说我姐姐被压迫得实在忍受不下去，曾去跳河寻死，但没死成，却被地主抓了回去，地主婆说：“要死也不能让你这样便宜地死。”就用烧红的火钳慢慢地烫她，把她烫得半死半活，然后关在一间黑房里，不让吃，也不给喝。就这样，我姐姐什么时候死去也没有人知道。一个五口之家，剩下母亲和我两个。种田不能，卖菜不成，只好去一家

纺织厂纺纱。那时物价天天涨，而老板却克扣工资，半个月才发一次，等我們領到工资时，钞票差不多成了废纸。我們整天为老板纺纱，到头来却連三餐稀飯都糊不上咀。母亲曾几次

想去上吊自杀，但见到我这可怜的女孩子，又不忍心抛下我。在这气愤和饥饿交加的日子中，母亲终于病倒了。没有钱请医生，我只好白天到乡下找草药给母亲吃，晚上纺纱。洋油贵，买不起，晚



上紡紗只趁着有月光的夜晚紡。为了想多掙点錢买米給母亲吃，积些錢給母亲医病，在月亮的微光下，我常常紡紗到天亮。人累了，眼睛睜酸了，我还是坚持着。这样，我眼睛很快地近視了。现在我眼睛近視得很深，就是旧社会害我的一个罪証。一九四九年，福州解放了，党才把我母女俩从水深火热之中救了出来！

旧社会把人逼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誰是仇人，誰是恩人，我永生永世也忘不了。解放初期，我参加了土改，分得了土地。以后，我又参加了革命工作。党的教育培养，使我很快提高了思想觉悟，我懂得了解放前不光是我一家人受苦，而是千千万万劳苦大众都受苦，这是整个被压迫階級的苦难。在日常的生活、工作中，我常常以过去苦难的生活来提醒自己，鞭策自己不要忘本。一九六〇年，組織上决定調我去北大食杂商店工作。当时我听说这个商店工作中的困难和問題很多，群众关系很不好，我不愿意去，要求組織另行分配工作。支部書記慢慢地开导我說：“淑芝呀！想想你是怎样生活过来的吧。商店和群众关系很密切，工作很重要，你不去那又让誰去呢？”我边听边想，不禁大哭起来。我感到自己开始忘本了，对不起党。組織上又关怀我，要我等肝炎病休养好了再去。我回想解放前父亲、哥哥和姐姐带病劳累而死的情景，現在自己有一些毛病，組織就百般关怀、照顾。我向書記表示了态度，第二天就去上班。

一到北大食杂商店，的确問題不少，賬目差錯多，任务完不成，周围群众对服务态度有意见。我想要改变这种落后状态，最主要的是要做好思想工作。一天，一个营业员从別店买东西，回来很气，說是跟卖东西的吵了起来，我就抓住这个机会，組織大家討論“假使我是一个顾客”的問題，并引导大家回忆对比，說明

今天当营业员的光荣和做好商业工作的重要意义。老工人黄书通在讨论中说：“旧社会商店你欺我诈，店员受气受苦吃不饱，老板肚皮一天比一天大。今天我们当营业员是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说得广一些，农民种米给我们吃、工人织布给我们穿，没有理发工人，人人头发眉毛都会连在一起，没有我们营业员，大家就会买不到东西，缺了那一行都不行。我们要求别人对自己好，首先要自己对别人好”。有的同志说：“拿一分钱去苏广店买针，也要看针眼”。“将心比心，我们营业员应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大家表示要爱店，要爱顾客，改善经营作风，做到顾客个个称心满意。通过这次学习，大家觉悟提高了。再加上时时关心大家，有点成绩就表扬鼓励，大家情绪越来越高。有个营业员过去工作不积极，准假三天，她拉十天。一九六一年她人工流产，住在协和医院，我把组织批给自己治肝炎病的红糖、鸡蛋、饼干等买了送给她，又将自己的钱借给她，这使她很受感动。有一天下雨，我见到一位六十多岁的老大爷向商店走来，一不小心差点跌倒，我连忙走出柜台扶住老大爷，问他下雨天上街来干什么。原来这位老大爷家里没亲人，自己来北大商店买东西。一听他说是来我商店买东西的，我内心受到深深的责备，我对自己说：“淑芝呀淑芝，你的工作没有做到家啊！”接着我就组织大家讨论这件事。发动营业员到大队和居民中去调查了解，把“五保户”、“军烈属”、“分娩户”和“双职工”、“人手不足的家庭”弄清楚，按时送货上门。这样做居民十分赞扬。有一次，一个女教师提前分娩，丈夫不在家，我们及时将分娩供应的东西送上门去，她感动得流泪。从送货上门的事，又使我认识到作一个营业员不是你买我卖的事，而是代表着党对人民生活的关怀，

必須做更多的工作。去年冬天有一天，營業員林幼惠送貨到五保戶陳秀如家里，見她老人家天冷沒草墊，他回來一說，我就動員大伙當夜把農民送給店里的稻草，搓的搓，編的編。第二天一早就把編好的草墊送去。陳秀如老婆婆感動地說：“你們真象我的親生女兒，真是毛主席教養出來的營業員。”去年八月間發洪水，大家都認為當時國家撥來的大量的供應居民過中秋節的月餅、素會、紅糖，如果不及時搶救，不但物資損失，而且會使居民拿到票買不到東西。責任感促使我們積極搶救公家財產。有的同志家里淹了也不回去。

我們做好了服務工作，反過來，群眾也給了我們莫大的關懷。居民把商店看成是自己的商店，把我們營業員看作親人，只要我們走出商店，家家戶戶見我們就打招呼，讓坐請茶，這一切又教育鼓舞了我們。就在去年八月抗洪的時候，我們忙到深夜十一點鐘，發覺大家還沒吃晚飯，店里雖然有可吃的乳兒糕，但這是供應物資，我們動不得，商量的結果去向飲食店借面粉來做飯，飲食店的店員們一聽說，過不多久送來一大鉢蔥頭煮面。去年我病在家里，有一天丁姑婆婆來店里，知道了，就跑到我家里來看我。最近，我參加工人講師團活動，附近居民幾天不見我，就到店里追長問短，知道我去工作才放心。軍屬任淑賢每天夜晚巡查都要到店四周看看，他說：“這是我們的商店，不看不放心。”

居民們把北大食雜商店看成是自己的商店，把我們營業員看成是親人，這是人民給我們的關懷，我們在這社會主義溫暖的大家庭里，越活越年青，越干越起勁。想想過去，看看今天，一個是人間地獄，一個是天上人間。

蘇 田 插圖

我当学徒的时候

福州机床厂工人 林建华

在旧社会，我们一家人受尽资本家的压迫和剥削。我的父亲是皮鞋匠，在梅塢路的一家鞋店里做工，赚的工资养不活一家五口人，母亲、弟弟、妹妹和我都是半饥半饱，整年喝稀粥，有时实在无米下锅了，就到娘舅家里去“过顿”。父亲为了让我们几个孩子多吃一口饭，多喝一口米汤，每天早上饿着肚子赶到店里去“凑饭桌”。一天，因为吃了极不卫生的剩饭残羹，不幸传染了霍乱病，但他还咬着牙去做工，到晚上回到家里已脸无人色，痛苦地对母亲说：“我得病了！”母亲大惊，我们三个兄妹都哭了！当时想住院急救，可是买药的钱都没有，那里有钱住医院，眼看着病情越来越恶化，母亲守在父亲的床边，眼泪象断线珍珠一样滚了下来。父亲已经不能说话，他失神地瞅着母亲，瞅着我们几个小孩，眼眶里噙满泪水。挨到第二天，父亲就在痛苦中死去了。那时我才十二岁。

父亲死去的时候，家里连买棺木的钱也没有，母亲把家中唯一的一口皮箱卖掉，买了一副薄板收殮。家里剩下三个小孩，母亲无法养活我们，只好到娘舅家里去。舅父本来就不宽裕，那里负担得起我们的生活。有一次吃饭的时候，母亲流着眼泪对我

說：“今天你們几个兄弟在一桌吃飯，再过几天，你的弟妹就要卖出去了！”过不了几天，我母亲哭哭啼啼把弟弟和妹妹卖给人家。旧社会就这样逼得穷人走投无路忍痛出卖亲生骨肉！

父亲死后，母亲曾經恳求鞋店老板看在死去的父亲的面上，收我当学徒。老板把我打量一下，哼了哼鼻子：“身材太矮小，不能用！”就这样打发走了。以后听说南平一家广福兴机器店要收学徒，母亲托人介绍我去，我揣着一床破棉絮，带了条裤子，就去南平当学徒了。

旧社会学徒生活的苦，三天三夜也說不完。到店里的第一天，大师兄就領着我到各个房間走了一趟，看看师傅有多少人，尿壺有多少只。以后，整天就是倒尿壺、开店門、扫地、劈柴、挑水、烧飯、排桌、收拾工具……。一直干了三年多，学不到一点技术。老板为了多賺錢，榨取工人血汗，每天晚上都逼着工人赶夜班，每晚九点左右，老板从評話場回来，就搬一条凳子，坐在車間門口監視；工人們起碼要干到十点过后，才准回去。我們当学徒的更苦，还要留下来收拾工具。旧社会資本家的工厂里的設備哪里象今天这样好，工具乱七八糟地扔得滿地，我們要花很多時間来整理，每天要过了午夜才能上床。第二天清早四点多，就得起来劈柴、扫地、烧飯。每天睡不上五小时，日长月久我的身体支持不住了，走路都打瞌睡。有一次在馬路上走呵，走呵，人迷迷糊糊的，一头碰到电綫杆上才醒了过来。老板对待学徒非常凶狠，动不动拳打脚踢。我一天干了那么多的活，从鷄叫做到“鬼叫”，等到躺在床上渾身骨头都散开了。有一天，醒来已过六点，老板突然闖进来，一脚把被子踢开，狠狠地把我拉起来，打了几个耳光，又重重地一推，把我摔倒在牆角里，耳朵被震得



嗡嗡作响。老板还恶狠狠地骂道：

“哼，想偷懒！吃了老子的饭，不干活！”

一天劳动十几个小时，有时夜里还要加班，实在支持不了，我们就利用给炉子加炭的机会，钻到木炭房里睡，钻出来时一看，全身黑溜溜的，象个黑炭鬼。木炭房虽然是老板轻易不去的脏地方，但不是每天都有机会去

装木炭，我们几个学徒在木炭房打盹也是不容易的，那么到哪儿好呢？我们就到厕所里打打瞌睡。当时南平的卫生情况糟透了，街道上都是粪便，苍蝇成阵，霍乱特别猖獗。那厕所又臭又脏，更不用说了！可是我们实在太困了，只好假装“大便”，在粪坑板上打瞌睡，解解困。

劳动是这样繁重，而给工人吃的又是什么东西呢？吃的是火烟味顶重的稀粥，喝的是清水泡烂菜叶的“下界爷”汤，难得见到的荤味，就是一小块手指大的带鱼，蒸得半生不熟。

吃飯的時候，當學徒的蹲在灶前，只要老板叫一聲“買小菜”、“打酒”，就得馬上放下飯碗，去跑腿。回來的時候，飯菜只剩下一点点，吃不飽的仍然是當學徒的。當時，許多人的營養極壞，嘴角發炎了，吃飯都痛。不久機器店搬回福州，有一天，我跑回家向母親哭訴。母親正病在床上，家裏的東西差不多賣光了，看見我這樣受苦，母親流下了眼淚，心痛地說：“建華，我再看看家裏還有什麼東西可以變賣，買一只毛鴨，給你補補身子。”過了幾天，我又偷偷回家，母親說：“我已買了一頭，不知你什麼時候才能回來，怕它壞，醃成咸鴨了。”我高興地說：“我連鴨肉是什麼味道都不知道，咸的也好！”誰知我接到手中，咬了一口，嘴巴火辣辣地，痛得眼淚也快流出來了。母親以為我咬破舌頭，就說：“不要慌，慢慢吃。”其實，我不是慌，是嘴角爛了，給咸鴨的鹽水一浸，象火燎一般疼痛。我只管哭，再也吃不下去了。

我們工人缺乏營養，嘴角糜爛，眼睛發澀。而資本家養的狼狗飯都不吃，要喂牛肉，吃得皮毛油亮。在資本家的眼裏，人是不如狗的。

“吃無飽飯，穿無衣衫”。我在南平時，不管天冷天熱，只有兩條長褲。夏天，把長褲卷起來，當“短褲”，到冬天又放下去。蓋的棉絮破得不成樣子了，只得用麻袋蓋在身上取暖。沒有鞋子穿，就找一塊廢木料，自己做了一雙“木屐”，怕“木屐”會磨壞，還特地在後跟釘上鐵皮。我們衣衫襤褸，渾身油黑，就象叫化子一樣。有一次，我肚子餓，到糰粿店裏買點心，糰粿店老板一看到我，趕忙出來問：“干什么？”我說：“買芋粿。”他瞪了我一下，沒好氣地說：“仔細看着，拿哪一塊要拿准，不

要挑来拣去！”在旧社会里，我們工人就是这样被人瞧不起，嫌我們脏，連自己出錢买东西也好象犯罪似的。

旧社会工人沒有地位，当学徒更是老板的奴隶，老板爱打就打，爱罵就罵。有一次，店里的一件工具丢了，老板无缘无故找到我的头上，使劲地往我的肋骨上踢了一脚。以后一到阴天，我肋骨就作疼，解放后才治愈。我的一个师兄弟性情很倔强，他有一次无故被老板打了，很惱火，責問老板：“你懂得法律么？”老板一听，反而更凶了，一边拳脚交加，一边从鼻子里嗤笑几声：“法律！我才懂得法律呢！”反动政府的法律就是資本家的法律，那里有工人說話的权利！我的那个师兄弟被打得遍体鳞伤，在床上躺了好几天。

不但老板欺負我們，連老板的儿子也爬到我們的头上作威作福。有一天傍晚，老板的一个九岁的小儿子，把手叉在腰上，神气十足地吆喝我：“建华！鷄关进籠子沒有？”老板的大儿子听見了，走出来对他的弟弟說：“你叫他什么‘建华’，叫他学徒仔就行了！”

学徒和工人生病，老板不理不睬，当成“病猪病狗”，还要誣蔑我們“偷懶”。我有一个师兄弟名叫德华，因为长期缺乏营养，得了“夜盲症”。有一次，我和他一起做夜班，发觉他走路时脚都要提得很高。我問他：“为什么？”他痛苦地說：“我一到晚上什么都看不見呵！”我說：“这不行呀，你不能做夜班！如果被車床的皮帶絞死，被地上的机器絆倒，怎么办？”自此以后，我們几个师兄弟就让他少做夜班，他的活由我們帮着干。而老板知道后，却对他大打大罵，說他“偷懶”、“不干活”，随后德华不幸症狀轉坏，得了“脚气”，而且是“暗脚气”，外表

看上去人好好的，却两腿发软，走路走不动。后来病越来越严重，肚子胀得很大，老板理都不理，有病得不到医治，就这样白白地送了命。我们实在忍受不下去，有的就偷跑了。可是老板订了一条苛刻的规矩，没有出艺，不准离开店里。老板把不堪虐待逃走的学徒诬蔑为“爬狗穴”，如果不幸被抓回来，就用藤鞭痛打。更毒辣的是，学徒逃跑后，老板把学徒的相片分贴在福州各个“机器店”，他们资本家是一鼻孔出气的，这个学徒就再也不要想吃“机器行业”的饭了。

资本家残酷地压迫、剥削工人，还非法地克扣工人的工资。我们学徒是不发工资的，每到年终，老板发给四元钱，还买不到一双胶鞋。老师傅的工资，也要凭老板高兴，他要发就发，要欠就欠。那时根本没有什么“十五号”发工资的固定日期。如果师傅打发学徒去要工资，那要看老板的神色，遇到他高兴，可能会发给你，遇到他不高兴，就要白白挨几记耳光和一頓臭骂：“亏本了！还发什么工资！”其实，抗战胜利后，老板勾结国民党军警特务，承包轮船上的机器修理业务，他们用偷工减料、以坏充好等办法，丧尽天良，大发横财，一宗订货就要赚几百包大米、几十两黄金。老板赚了钱，生意越做越大，除了做机器生意外，还开了两家锯木厂，后来又买了一条轮船，专门跑香港、台湾，贩运货物，搞投机买卖，赚了不少“黑心钱”。有一次，老板叫我拿秤，我以为他干什么，偷偷在门缝里张望，原来他是在秤黄金！人家黄金是用小天平几两几钱称，而他却用秤来称，可见他剥削了我们工人多少血汗！而老板却还向我们工人说什么“亏本”，故意拖欠我们的工资！工人的血汗全都变成了黄澄澄的金子，流进了老板的腰包，老板买田地，置房产，吃喝玩乐，过着

荒淫无耻的生活。当时，有一个姓薛的老板（股东之一）挥金如土，买了一部摩托車給他儿子，他儿子整天騎着摩托車在街上兜風，上舞厅、玩女人，无恶不作。后来，他儿子不爱騎摩托車了，老板又給他換了一条小汽艇，在閩江上开来开去，摆闊綽。老板花的这些錢从哪里来，还不是从工人身上剝削来的！

想想过去，看看現在，新社会的学徒真是太幸福了。学徒进厂，每个月有固定的工資，不愁吃不愁穿。党和国家对年青一代十分关怀，創造了良好的学习条件，过去学徒要学一点技术真是不容易，現在，老师傅們就怕学徒学不会技术，恨不能一个早上就把自己的全部技术教給你。每一个学徒进厂，都指定一个师傅，訂立师徒合同，包教包学；等你初步掌握了技术，就分配給你机床，让你独立操作；下了班，你可以到学校学文化，可以上文化宫看电影。这些，是我們过去在旧社会当学徒想也不敢想的啊。

完 无插图



“卖身契”

福州第三工具厂 陈宗玉

解放前，进工厂当学徒，首先要订个“艺约”，同时要缴押柜金，找“店头保”，工人都把这“艺约”叫做“卖身契”。

那是一九三九年的事了。那时，我正十八岁，家里很穷，靠爹妈做苦工挣来的钱无法维持生活。有一天，爹妈听说福电铁工厂要招收一批徒工，便决定送我去。于是我就到福电铁工厂去报名，经理打量了一下我粗壮结实的身体，问了我的姓名和家庭情况后，便说：“一百块银元押柜金带来没有？”“什么，还要交钱？”我不明白地反问。“这是厂里的规定，学徒入厂，除了订‘艺约’外，还得缴押柜金，并且自进厂日起，你们要遵守一切厂规，不能半途而废，否则，就没收押柜金。”听了经理的话，我全身冷了半截，没回半句就走了。经理紧追出门口，转换口气地说：“回去跟家里商量商量，机会难得，切莫错过。……”象我这样穷苦的人家，一日三餐连稀饭都吃不上，那儿来的这笔巨款？别说一百块银元，就是一百个铜板一时也难拿出。

回家后，我把情况告诉了爹妈。妈妈听后，眼里含着泪水说：“孩子，这年头有什么办法？不想法子弄到一个饭碗，寻个避难处，怎么活下去？！……”于是，家里开始给我筹划这笔钱，一家

人过年过节穿的稍为新一点的衣服都拿去卖，一些较好的家具也都当、卖个精光。可是，总共还凑不上几十元，怎么办？爹妈只好去求人情，向亲戚朋友借债，不知登了多少人家的门槛，最后才凑足一百元。过了几天，我就到工厂去办入厂手续。好不容易缴了押柜金，我想现在总可以踏进工厂的大门了。可是谁知道，经理又嘻皮笑脸地问我：“你的保家是誰？”“保家，沒有！”我很干脆地答道。“那可不行，‘艺約’上規定要有企业人員作介紹人，同时要有一个‘可靠的’‘店头保’才行，否則你半途跑了叫我們找誰？”

这下子又把我难住了，象我这样穷的人家，有的是同病相怜的苦难兄弟，那儿来的“可靠”的人作保家？我的心情更加沉重了，悔不該走这条路，弄得进不得，退不得。我回家跟父亲說：“爹爹，我不干了，把一百块光洋討回来！”爹說：“孩子，还是干下去吧！再說錢也討不回的。”于是，家里又費尽心思到处哀求，最后才在工厂里找到了一个担保人。但人家总不能无代价的替你效劳呵，得送点“小意思”，請他們吃一頓才行呀！这样，家里又东拼西凑，借了一笔款，办了两桌酒，請介紹人全家吃了一頓，才由他出面“担保”，踏进工厂的門。

但入厂沒几天，資本家又耍了花样。說什么入厂的头六个月，是試用期，要自备伙食。当牛馬还得自备粮草，这是什么世道！我气愤地說。可是，又有什么法子呢？我一边托人写信告訴家里，一边忍气吞声地干着。那日子是苦极了，穿的“蝴蝶衣”，三餐吃不飽，每天晚上还得餓着肚皮去加班四小时。資本家一不如意，就要被他狠狠地打罵一頓。我想离开这里，另找出路。可是在旧社会，到別处还不是一样！我想了又想，还是勉强

干下去。我不相信这世界永远是他們的。沒隔多久，我接到父母亲来信，当把信拆开一看，霎时觉得天昏地暗。原来是家里把我的弟弟卖掉，寄来一张汇票，給我交徒工試用期的伙食費。我仿佛看見了我的弟弟，死抱着媽的脖子嚎哭……。这是多么凄惨的一



幅人生图景啊！我拿着那张汇票手直颤抖，我的一家就是这样被弄得傾家蕩产，被逼得骨肉离散的。

可恶的“卖身契”制度早已不存在了，苦难的生活也已过去了。然而，每当我想到这一段悲惨的经历时，就越发觉得今天生活的幸福，越发觉得浑身都增添了力量，决心把各項工作和生产搞得更好！

賴承光整理

究 龙插图

伤疤恩仇記

福州运输公司工人 何永安

我的两只小腿上，至今还留着两块碗口大的伤疤。这个伤疤是旧社会罪惡的見証，它記錄着我难忘的階級仇恨，也記錄着党的恩情！

一九四六年夏天，一天下午，雷电交加，暴雨如注，我和几个碼頭工人一起在茶摊里躲雨。这时，把头尤二妹穿着长統雨鞋，撑着洋伞来到茶摊。他一看到我們，凶神恶煞似的，把长烟管朝桌上一敲，气势汹汹地吼道：“你們倒真会享福！船到了，还不快給我搬貨去！”我說：“老板，等雨稍停再干吧，要不然貨物会淋坏，我們也会被淋出病来。”不說犹可，这一說可惹怒了这只专门吮吸工人膏血的恶狼。他狠狠地盯了我一眼，破口罵道：“永安，你这个臭婊子养的，也敢嘴硬，我看你是不想活了！”那时候，我們碼頭工人的命就捏在把头的手里，連讲一句話的权利都沒有，我真是又气又惱。大家生怕事情鬧大，对我不利，便把我拉走，冒着暴雨去搬运。

我們来到碼頭，只見一只貨船泊在閩江边，一条又长又窄、又湿又滑的跳板，从船上伸到碼頭。我因为肚子餓，四肢无力，

一包二百斤重的貨物压在背上，刚踏上跳板几步，身子突然一晃，一个筋斗滑倒下去，两只腿砸在碼頭洋灰台上，登时皮开肉裂，鮮血淋漓，痛得如同針刺一样。我們整天象驢馬一样地干活，資本家采取什么“抽头錢”、“揩錢尾”等十多种剝削手段，平时掙到的錢顾不了自己的肚子，受了伤哪有錢治？为了活命，我只好带着腿伤去出工。几天的繁重劳动，我的两只腿都肿得象大冬瓜一样了。我們碼頭工人就靠四肢掙飯吃，現在两条腿受伤，提不动，这可真把我急坏了。工人們也很同情我，可是他們象我一样身无分文，又有什么办法呢？后来，我只好硬着头皮到把头家里，要求借些錢治伤。当时，把头尤二妹正和他的老婆一起吃飯，桌上摆滿了鷄、肉、魚，他一見到我，就气虎虎地說：“你来干什么？”我說：“想求你借点錢治伤！”狠心的尤二妹奸笑了一声說：“借錢治伤，你說的比唱的还好听！碼頭上的工人这么多，我借得了嗎？你今天活着，明天能不能活，还不知道哩！伤是你自己的事，我有錢也不能借給你。”我借不到錢，还受了一陣辱罵，心里真是气忿！旧社会，穷人真是沒有活路啊！

生活逼得我无路可走，不得不咬牙忍痛，掙扎着在碼頭上搬运。用工人的血汗养得胖胖的尤二妹，认为我身上的“油水”快干了，要不加紧压榨，以后就会失去机会。因此在派工时，总是叫我干重活、难活，还經常迫我干額外的活。記得一九四七年六月間的一天傍晚，我刚干完一天活，一身累得象散了架，正坐在茶摊里休息。突然，尤二妹窜进来了，喊道：“永安，現在有一批軍粮（調給伪軍的）得馬上搬运，你們一班立即去！”我猛一怔，心想：尤二妹这只恶狼真是成心想折磨死我了，他明知我們一

班的工人都不在，而且搬运“军粮”不能拿分文工钱，我哪里有什么办法去叫班里的工人来干呢？他分明是要我一个人去干呀。那时候，我脚上的伤口还烂着，心里真是气恼，便说：“我们班里的人都回去了。”尤二妹一听，猛地吼叫起来：“只剩下你一个人也得去搬完！”在把头的威逼下，我只好憋着一肚子气去搬运。当我扛上第一包粮食到码头时，他又站在码头的路旁，用那根旱烟管，不断地敲着我的脑壳说：“这是‘军粮’，今晚搬不完，我就要你的脑袋！”从傍晚开始，我一刻也没停歇，把五十七包粮食从台江码头搬运到加工厂，直到九点多钟才搬完。这时，我的四肢好象离开了自己的身体，两脚麻木，脚上伤口痛得象刀剜。

繁重的劳动，使我的脚伤越来越严重了。到了一九四九年初，两只小腿伤口终于溃烂了，浓血到处染，先是四肢，接着全身都生了毒疮。没多久，我就不能动弹了。这时，尤二妹看到我



不行了，就狠心地一脚把我踢开。失业加上疾病，我整天只能躺在码头的底层里呻吟。码头上的工人兄弟虽然给我生活上一些接济，但他们自己也很困难，我怎能长期依赖他们呢？我只剩下一副皮包骨头了。许多工人兄弟都感叹地说：“永安眼看是没有希望了！”我想：

“要死也要死在家乡，还是回家去吧！”于是，在一九四九年五月，我請求一位乡亲，用渡船把我运回家乡閩侯琅岐。

回到家乡后，在我哥哥的照料下，我的命又拖活了几个月。正当我在忧虑活不成、死不了的时候，突然一声炮响，閩侯和福州都解放了。这給我增添了生活的勇气和希望！我顾不得哥哥嫂嫂的挽留，立即带病回到福州。那时，有些乡亲还悄悄議論說：

“永安已病成那个样子，恐怕去福州也不会活多久啦！”那知，我回到福州后，党和人民政府正派工作組接管碼頭，筹备成立搬运公司。我找到工作組的同志，說明了情况，党和政府立即送我到医院去医治，生活上也給我无微不至的照顾。在医院住了几个月，政府花了很多錢，终于把我腿上的伤和身上的病医治好了。伤一好，党立即安排我在碼頭工作，并让我担任生产小队长。

福州碼頭經人民政府接管后，那个在解放前肆无忌惮地榨取工人血汗、罪恶重重的封建把头尤二妹，终于被我們工人斗倒了。从此，我們解放翻身，揚眉吐气，不再受压迫、被剝削了。由于党的不断培养，我的阶级觉悟逐漸提高，一九五四年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且从一九五一年起，一直被公司里評为先进生产者。

我一家的生活，变化也很大。我有了工作后，不久就和弟弟何永乐一同回家乡同时結了婚。那天，全乡都轰动起来，有的說：“我們以为永安早就变成鬼了，想不到今天还能回来成家！”現在，我的哥哥仍然在家种田，我和弟弟都在运输公司工作。弟弟也是党员，他一家生活也过得很好。

我們今天有这样的日子，得来是多么不容易啊！如果不是共产党领导工人阶级、劳动人民起来推翻压在我们头上的帝国主义、

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我何永安早就不在人世了，那还有今天这一切！所以，我一定记住党的教导，不忘过去的苦，不忘阶级仇恨，坚持革命到底！我还要把自己的家谱讲给青年工人听，让他们懂得过去，懂得今天，更好地去创造美好的未来。

陈石、丁一人记 谷 水插图



林 場 旧 恨

宁化共青团伐木場退休老工人 李 承 福

那是二十多年以前的事了。

当时我二十一岁，因为在农村实在活不下去，就跑进深山里当伐木工人。

伐木场的老板馬世才是个活阎王。他手下的工头、爪牙有十来个，个个持枪执鞭，欺压工人。馬世才还勾结官府和当地土匪，那神气可真是了不得。当年，我们伐木工人天天从鸡叫做到鬼叫，工资虽说有六、七角钱，可是工头抽去领班费百分之五，场里又扣“福利”费百分之五，七除八扣，实际拿到手只有四、五角钱，工人的生活都很苦。

有一天晚上，山里刮着大风，落着猛雨。这样的鬼天气一来，我们的工棚就变成了水池。大家忙着用斗笠、棕衣遮盖被子。这一边还没弄停当，那边工头王伯钱气势汹汹地跑进来吼道：“他妈的，你们都成死人啦！还不赶快防洪去！”大家无可奈何，只好丢下仅有的破铺盖，去为老板卖命。可怜的是，这时候有个名叫张泽生的工人生重病，正在发高烧，大家走后没人照管他，被雨一淋，冷热相攻，没等到我们回来就死在破棚里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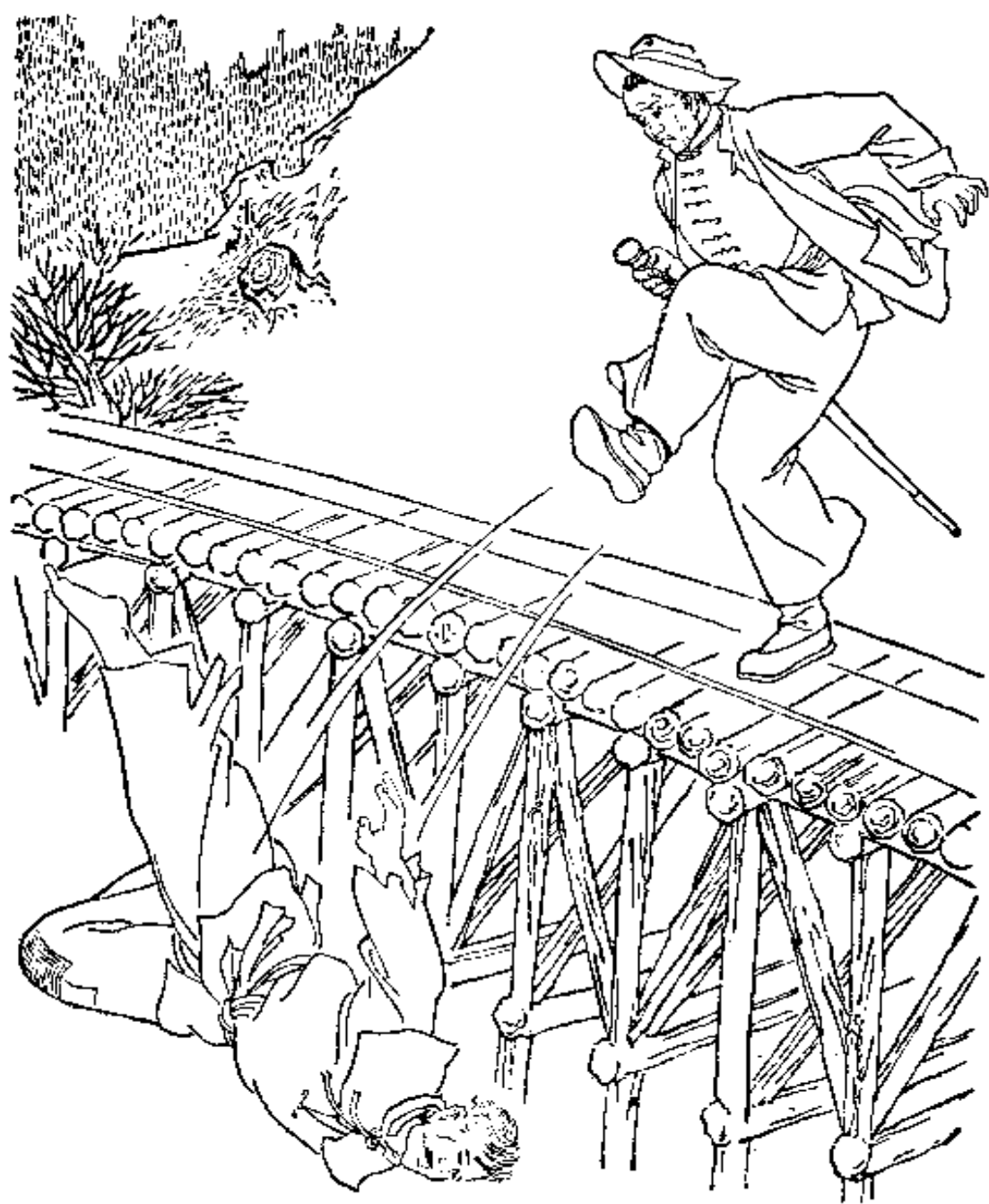
第二天，天晴了。大家考虑到这样下去，说不定自己也会落得象张泽生那样的下场。于是几个人凑在一起商量，决定先修房子再说。正在这时候，馬世才又带着工头持枪执鞭来逼我们出工。大家忍不住了，决心斗一斗，齐声喊道：“我们要修房子，不能出工！”老板馬世才看情况不对，便假惺惺地说：“好哇，你们修吧，我老馬一贯就是关心大家的嘛！”

“算了吧，不逼死人就算好了！”大个子工人张泽福当场就给他顶了回去。馬世才狠狠地盯了他一眼，气呼呼地走了。

通过这件事，工人们懂得团结就是力量，斗争更坚决了。但是，老奸巨猾的馬世才怎能和我们罢休。

有一天，工人们扛着笨重的材筒来到轱路桥头。这时天已黑了，大家整整劳动了一天，饿得肚皮贴着脊梁，脚酸手软，头昏目眩。走在最前头的大个子张泽福刚踏上桥板，一时支持不住，摔倒了，笨重的材筒从他身上滚压过去。

可恶的工头王伯钱听见“扑”的一声，恶狠狠地赶上前去，把摔伤躺在地上的张泽福一脚踢下深潭。一个不上二十岁的青年就这样死了。但老板、工头却欺骗大家说是他自己失足落水。因为当时天黑，后面的人和他相距又远，没弄清底细。但后来见那些工头、爪牙得意忘形，大家就猜出来了。一天，工人刘振潦从王伯钱的窗口经过，听到有几个醉醺醺的人在夸王伯钱，说：“还是老王有办法，把张泽福那小子干得真开心！”这时刘振潦才恍然大悟。这事一传开，工人们象山洪暴发一样，当场就想干起来。刘振潦忙劝止大家说：“凡事要先商量，准备好了干，才不会吃亏！”大家都把火压在肚里。



午飯后，我們看着周圍沒有坏人，几十个人便聚在山場堆头下面。大家你一言我一語，爭着发言。有的說：“我們一定要报这个仇！”有的說：“我們工人是硬骨头，只要齐心，什么也不用怕！”

沒想到隔牆有耳，大家的話被老板的爪牙偷听去了。狠心的

老板又使出了毒計，馬上派出一伙爪牙，悄悄爬上山頂，把山上的材筒朝工人聚集的地方推下来。一霎时，天崩地裂，无数根木头泰山压頂般地向着毫无准备的工人身上滚压下来。山場下血肉横飞，一片惨叫声，只有几个站在外边的工人脫了險，其余的全被压死。这一血海深仇，引起了全体工人的无比憤慨。大家一起冲到老板办公室去。老板馬世才仗着有他豢养的一伙爪牙做帮手，大搖大摆地出来罵道：“誰叫你們不遵守規矩，这是你們自討苦吃，死掉一些才好！”大家一听，就象火上浇油，几个青年工人首先动手打了起来，和工头、爪牙扭成一团，屋子里頓时乱成一窝蜂。工头、爪牙被工人打倒了好几个，老板馬世才也被打得焦头烂額。可是这时候，山上的土匪聞訊冲杀进来。这一突然的里应外合，把工人們打散了。以后，这个場的伐木工人被迫流散四方。……

資本家的残酷压迫和剝削，必然会引起工人的反抗和斗争。但是这种斗争，沒有共产党的领导是不能取得最后胜利的。一九四九年，全国解放了，我們伐木工人才真正翻身，成为国家的主人，开始了新的生活。

谷 水插图

我家的变迁

福州火柴厂退休工人 陈大妹

經受过旧社会阶级压迫痛苦的人，更能体会到今天生活的幸福！我每回忆过去，也就更热爱新社会。年青的一代，也许体会不到我们老工人的这种心情，所以，我就想再谈谈在旧社会的经历。

解放前，我和丈夫、儿子和女儿一家四口，都在福州火柴厂做工。那时，男工工资一天顶多能拿到一斤十小两米，女工顶多能拿到一斤四小两米。要是生病不能上工，就不能拿到工资，并且要遭受失业的威胁。更悲惨的是工人的性命不如一只狗。一九四七年間，我的女儿雪珠突然生了病。开头，为了全家三餐，不仅没有办法替她請医买药，而且还搀扶着她进厂上班。拖了十多天，女儿的病一天天沉重。有一天，全身烧得象火炉，神志昏昏迷迷，我只好背着她到塔亭医院診治。医生一检查，吃惊地说：“这是第三期的伤寒病，要住院才能得救！”我家吃饭都难，哪里有錢让女儿住院。但为了救女儿一命，只好当了一些破衣服，又托乡下的叔叔向地主借高利贷，才勉强把女儿送进医院急救。过了一个多月，女儿的病虽然摆脱危险期，但还不能下床走动。由于担負不起医药費，我只好背她回家养病。过了几天，肥头肥脑、两



眼朝天的工头，神气十足地对我說：“大妹！經理要你女儿明天就来上班，要不就取消名額了（即开除出厂）。”我再三恳求說：“她还站不稳，求你們寬容几天吧！”工头粗声粗气地說：“走不动，站不稳，是你們的事！不来上工还有別人会来干！”为了保住一个飯碗，我回家忍着眼泪对女儿說：

“雪珠儿呀！老板要强迫你去卖命，要不以后就失业了！”我母女俩就抱头

大哭起来。第二天天一亮，我就把她从家里背进車間里，晚上又把她从厂里背回家。她既不能走，又不能站，我只好找一块凳子，弄个工作架，让她坐着做。其实是我帮她做，一个人干两个人的活。

又过了几个月。有一天，我的丈夫秉衡和儿子祥皓，被厂里无故开除了。本来一家三餐已經难熬，加上女儿病中借貸，利滚利，債一月比一月增重，当在当鋪里的衣服也无法贖回；如今两个男人失业，往后日子怎能过下去呀？我去向資本家和工头求情，工头假慈悲地說：“經理还是体念你家中有困难，要不連你母女也該取消名額了……。”原来，厂里火柴銷路日益减少，資

本家为了榨取更多的利潤，便不断地把工資較多的男工开除掉，而留工資低微的女工干。从此，一家的生活就靠我和女儿一天二斤米的收入来維持。我的丈夫气愤地說：“我在火柴厂里当了七、八年的搖磷工人，要干粗能粗，要做細能細，力气总是尽力使，想不到还是叫开除了，这是什么世道啊！”又过了几个月，厂里原材料不足，我和女儿也不能正常地在厂里做工了，債務逼得又紧，害得我丈夫吃不下，睡不着。有一天，突然对我和女儿說：“这个旧社会要把我們穷人活活逼死了，我既不傻瓜，也不残废，一个男子汉竟坐着靠你母女来养活，真比上刀山还难受，不如早点死，免得你們多受累……。”我們以为他說这話只是发泄心中的憤慨！第二天上午，他对我們說回乡去看他的兄弟，到中午时分，一位堂侄急急忙忙来报信說：“他自縊死了！”我一听这話就昏倒在地上……。

好容易，熬到了一九四九年解放。我們一家总算翻了身。解放后，我的女儿从工厂調去读书，現在已在福州康复医院当医生；女婿在动力机器厂当厂长。儿子参加了工作，也参加了共产党，現在閩侯专署工作；媳妇在福州火柴厂里是个先进工作者，也是共产党员。我这受尽煎熬的十分衰弱的身体，解放后也得到了国家和党的照顾，享受退休养老，过着安乐的晚年生活。想起过去旧社会的苦难，我怎能因今天的欢乐就把过去忘記呢？

实 人插图

三輪車工人的今昔

福州市三輪車工人 張增福

我是一个三輪車工人，解放前一直拉人力車。在旧社会，人力車工人被人叫做“車伕”、“車仔”，是最下賤的。現在想起那七八年的拉車生活，真忍不住要落泪。

我出生在貧苦人家里，懂事的时候，全家有八个人，父亲和哥哥在洋头口一家角梳店做工，祖母和母亲向地主魏大胜租了两亩八分地来耕种，一家人就靠这些收入糊口。但这样的生活也沒能維持多久，因为“洋貨”的排挤，角梳厂倒閉了，父亲和哥哥就失了业。地主魏大胜的地租又一年比一年高，而且不管有无收成，逼着要繳地租。不久，因为冻餓交迫，年幼的侄儿就活活餓死了，祖父祖母病倒床上，也因为借不到錢买药，先后死去。哥哥又在这时候被保长抓去当了壮丁，一去再沒回来，嫂嫂受不了孤苦的生活，也到外地謀生去了。父母亲眼看着一家人死的死，走的走，也伤心成病，相继死去。八口人的家庭，就丢下了我一个孤儿。

一九四三年，我还不到二十岁，什么工作都找不到，只好去拉人力車。我跑到車館去租車。車館老板要我找“店头保”，我只有一人一条褲，誰敢給我作保呢？好容易托朋友向南門車館說

情，老板才租给我一辆破旧的、没有胶轮的人力车。就这样，我起早摸黑、早出晚归，拉起人力车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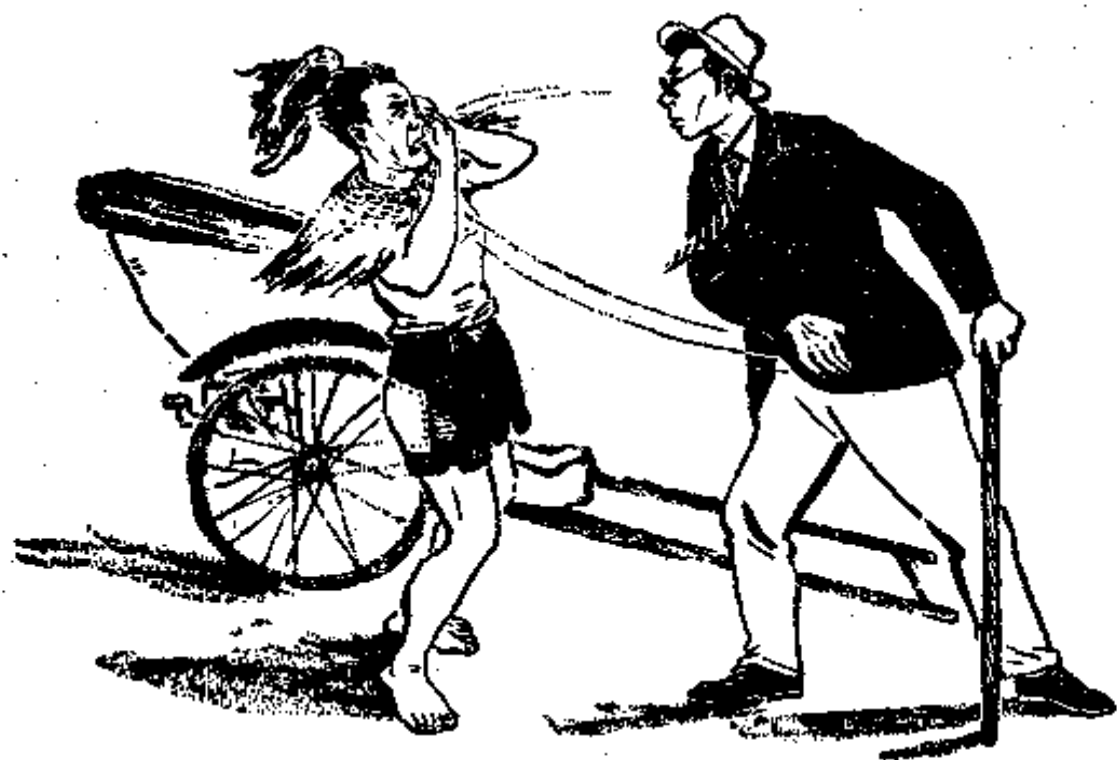
那时候，物价暴涨，一天几变，我拉一天车赚的钱只能买一斤米，有时连一斤还买不到。为了多买点米糊口，我想了一个办法，把米袋、油瓶装上车斗里，一赚到钱，就马上就近买米，但这样还是跟不上。有一次，我拉了一位乘客由龙潭角去湾边，当时说好的价钱算起来可以买二斤米，我就拼着命紧跑，生怕米价又涨，可是谁料到当我急急忙忙从湾边跑回福州米店一间，米价已经涨了四倍，二斤米钱只能买半斤了。在那样的社会里，我虽然没日没夜地干，到头来还是两手空空，全部财产就只有两条短裤和一件破棕衣，一年四季、晴天雨天都是这一套。

但是，这样就算苦了吗？不，还有比这更苦的呢。当时，我们人力车工人有“五怕”：一怕兵，二怕警，三怕地痞，四怕闊少，五怕车老板。车老板是催命鬼，不管你赚钱不赚钱，每天都逼着你交租，一不高兴还要停租你的车，连你讨饭的碗都敲碎了。警察呢，更是地头蛇，叫人力车工人给他们洗厕所，扫房间，办杂事，还常常以“做会”、小孩做“三旦”、“做寿”等等叫我们送礼，要是不送，在马路上拉车就困难了，他们会用各种办法刁难你。那些乘车的闊佬兵痞，我们辛辛苦苦拉着他跑来跑去，不但不说一句好话，还动不动辱骂殴打，不给你钱，甚至敲烂你的车子。有一次，我从小桥拉一位乘客到西门渡鷄口，车到中途，一个蒋匪军“八十师”的兵把我拦住，无理强迫乘客下车，又逼着我将他拉到新店，却一个钱也不给。有一次，那正是六月天，太阳毒热，我在东街口碰到了一个西装笔挺、一手拿扇子、一手拿“文明棍”的闊少，要我把他拉到水部王庄去洗澡。

我因为路烫难走，又沒草鞋，就对他說：“我实在沒有办法，送你到湯門吧！”他脸色一沉，說了句“我給你草鞋穿！”就狠狠一杖劈头盖脑打下来，我赶紧往旁边一躲，文明棍打在車柄上，“卡嚓”一声折断了。这一下他更火了，扑上来揪住我就用拳头打，我不敢还手，只好一边遮拦，一边向他求情，答应把他送到百合澡堂（今大众澡堂）。到了百合澡堂，他不給錢不算，还要把我的車垫拿走，我跟他爭执，他一車垫朝我打来，沒打着我人，却把車柄打断了。在那样的社会，我們穷拉車的，能有什么办法呢，只好自认晦气，把車拉回去修理。

象这样的事情真是三天三夜也說不完，人力車工人哪里是被人当“人”看待呢？簡直連牛馬都不如啊！

那时候，我天天盼，夜夜盼，盼望着有一天能挺起腰来，能象一个“人”那样生活。这一天终于到来了，一九四九年八月十



七日，福州天空飄起了五星紅旗，從此，我們人力車工人開始了新的生活。解放不久，我就結了婚，現在一家七口人，愛人在市第一角梳廠工作，最大的小孩已在小學讀書，最小的進了托兒所。一九五六年，我響應黨的號召參加了市交通服務社。不久，手拉人力車廢除了，領導上分配給我一輛三輪車。接着，我又被評為市的先進生產者，市交通系統的服務標兵。一九六〇年我參加了偉大的共產黨。去年我又被評為市交通系統一等先進生產者。所有這些，都是我以前做夢也想不到的。

我們社會地位提高了，服務性行業也受到了社會上的尊敬，乘客們都對我們“同志長、同志短”，親親熱熱象一家人。記得有一次，我送一位解放軍同志到北門外去，經過一個上坡時，這位同志下了車幫我推，到了他家里，他又打水給我洗臉，還煮了一碗饅頭給我吃，我左推右推他都不答應，非叫我吃完了才讓走。象這樣的事情，我不知碰到過多少回了。

現在，我已被調到社里工作，每當我看見社里新招收的工人，看見社里撥給他們新三輪車，派專門的人教他們踏車技術，學習期間每人每天還能得到八角錢的生活補貼費的時候，每當我看到乘客們寄來的表揚某一個三輪車工人的服務態度的時候，我便不由得想起舊社會的苦難的經歷，因此也就更加痛恨舊社會，更加熱愛新社會，渾身就有使不完的勁頭。是共產黨毛主席使我由舊社會的牛馬變成了新社會的主人，是新社會給了我今天的幸福和光榮。

何家和、洪植蔚記錄整理 蘇田插图

“九命沉冤”今雪恨，党的恩情記心間

福建省汽車修配厂工人 阮宝玉

我是省汽車修配厂的工人，家住在福州远洋乡。解放前恶霸地主孙亨梧杀害了我的父亲、叔父和哥哥，解放后，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支持下，我一家人和全乡被害的农民兄弟們一起，进行反霸斗争，镇压了大恶霸孙亨梧，报了仇，伸了冤。

大家都看过閩剧“九命沉冤”的戏吧！戏中的阮宝霖就是我的亲哥哥。被恶霸杀害的九条人命，第一个被害者名叫番仔，第二个是潘垵乡一个摸蜆仔的人，第三个被害者是在孙亨梧的碾米厂做工的一个工人，第四个和第五个被害者，是因过江給父母送飯，經過恶霸强占的蜆仔田，被他活活淹死在江中的两个小孩，第六个被害者是一个姓林的老年农民，孙亨梧为了伪造罪証而把他杀死。加上我家被害的三条人命，一共九条人命被孙亨梧杀害，在旧社会冤沉海底不得伸雪。

我家的三条人命是怎样被孙亨梧杀害的呢？

孙亨梧是个大地主、大恶霸。他不但霸占了良田二百多亩、蜆埕二千多亩，而且还開設鋸木厂、碾米厂，在福州城里还开了宝泉酒庫。这些财产都是吸尽城乡劳动人民的血汗得来的。他們不劳而食，过着花天酒地荒淫无耻的生活。并且凭借財势，勾結

官府，养一批狗腿爪牙，专门残害乡里农民，无恶不作。

有一天，有两个小孩子给父母到田里送饭，为了走近路，从江边蚬埕经过。孙亨梧为了独霸江中的蚬埕，就想出毒计，拿这两个小孩开刀，诬赖小孩子偷“他的”蚬仔，指使爪牙恶狠狠地舞起大刀不让小孩子上岸。当时潮水正不断地上涨，两个小孩子活活被淹死在江中。

两个孩子被活活淹死这件事激起了乡亲们们的愤慨。我哥哥宝霖为了打抱不平，当下去责问孙亨梧。这就触怒了恶霸，孙亨梧怀恨在心，图谋迫害我们一家。

当时乡里有十二亩乡产公田，作为全乡小孩子上学的学费之用。这十二亩田是租给我父亲和我叔父种的。那年稻子快要成熟的时候，孙亨梧存心害我全家“倒碗绝食”，负债欠租，就带了二十八个狗腿，拿着镰刀、扁挑，带着杀人的刀子，驾两条船去强割这十二亩洲田的稻谷。乡亲们看到恶霸明目张胆地要夺走我全家赖以活命的粮食和全乡孩子的学费，大家都非常愤慨。当地主的船经过村前的时候，大家就跟他们说理，可是狗腿们仗势不理，只好眼巴巴地看他们抢走我们的劳动果实。

但是孙亨梧还不以此为足，当晚又请了那二十八个狗腿大吃大喝一场，吃完后，他们又带着凶器来寻衅。我父亲当时已经六十五岁，他老人家想自己平素为人忠厚，深受乡亲们敬重，以为地主不至为难。他看到孙亨梧来势汹汹就跑上去对他说道理：

“你们来有话好说，千万不要动手动刀……”恶霸那会讲什么道理，孙亨梧对他的狗腿说：“谁敢拦阻，杀死他，有我作主！”狗腿们听了主子的话，就七手八脚，对我父亲连砍十一刀，我父亲当场致死。当时我哥哥宝霖跑去一边抱着父亲的尸体痛哭，一

边与地主狗腿搏斗，结果也被坏蛋在肋部砍了一刀。我哥哥见他们人多，有武器，为了不吃眼前亏，只得逃走。我的二叔父当时闻讯即拿着木棍前往援救，被地主狗腿们团团围住，砍了七刀，浑身鲜血淋漓，他勉强地支持着身子走到家就死去了。当夜孙亭梧又遣人半夜潜入我家盗尸，企图消灭罪证，幸好我们都在场看守，地主的阴谋未能得逞。



我的三叔父阮世利，看到家中惨景，想给全家报仇，到伪福州市法院去告状。可是旧社会的衙门是和地主、资本家串通在一起的。到传讯时，先传孙亨梧，他有钱有势，到了法院，人家对他让茶让坐，他还带了一布袋的钱向全市的律师行贿。就这样第一庭我们输了。我叔父又到伪省法院去告，孙亨梧为了进一步害我们，指使他的走狗孙利淡把他病危的岳父林占坤杀死，诬告被我哥哥宝霖所杀。第二次法院一开庭，伪法官开口便问我哥哥“你为什么将林占坤杀死”，他们还威胁收买了郑哑佛作“证人”，好在董宗德来为我们作证，不然的话我哥哥告状不成，反而要成为罪犯了。

后来，在乡亲们支持下，我哥哥身背黄状到省城控告。群众见到的都表示同情，激起义愤。有人就对哥哥说伪省长什么时候会出来，于是我哥哥就背了黄状到伪省政府门口去等，伪省府主席刘建绪出来的时候，威风凛凛，见到有人告状也不理不睬，后来在周围群众的压力下，才不得不叫勤务兵接过了黄状。可是一天两天、一个月两个月过去了，毫无下文。一九四七年我叔父和哥哥又去南京伪最高法院告状，旧社会“衙门八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就是找伪最高法院，同样是冤沉海底。我哥哥到处告状，花尽钱，借了债，变卖家当，结果受尽了那批反动官僚的愚弄和压迫，有冤难伸，而血债累累的恶霸地主却逍遥法外。由于过度的气愤，我哥哥伤口复发，就这样悲惨地死去。他临死前叮嘱我们说：“一定要替父亲、叔父报仇”，还交代将棺木密封摆在家里留作罪证，并把血衣等物交给世利叔父保存。

宝霖兄死后，留下嫂嫂、侄儿。嫂嫂还有身孕，全家万分悲痛地办了丧事。地主恶霸见没有人和他作对了，就叫来爪牙走狗

大吃大喝，大放鞭炮大庆贺，幸灾乐祸比虎狼还狠毒。

一九四九年福州解放了。十月間，土改工作队到我家乡，到我家訪問。开始时，我們觉悟很低，认为在国民党时期告了几年，都不过如此，你們这些穿土布衣服的人又有什么本事。經過工作组不断教育，我們才慢慢有了認識，后来就向工作队同志訴說冤情，帶他們看了三部棺木，拿出死者相片和过去的許多呈狀，呈狀迭起有一尺来高。后来，人民政府逮捕了孙亨梧等罪大恶极的坏蛋，召开公审大会，枪毙了孙亨梧，其他爪牙走狗也得到了应得的下場。共产党替我报了这血海深仇，这使我世代也忘不了。我要永远記住阶级仇恨，警惕阶级敌人；永远跟着党走，努力做好工作，报答党的恩情！

谷 水插图